

中國大陸分層化社會的轉型與發展

曾春滿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講師

摘 要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反階級、反壓迫，社會主義的實踐道路是追求公平與正義。廣大的工農聯盟曾經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群眾基礎，不幸的是，建政60餘年、改革開放30餘年來，農民工居於社會底層的命運仍沒有改變，如今並已形成一股反社會力量，迫使中共領導人必須提出「和諧社會」以及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方略來壓制這股社會群體抗爭聲浪。因此，本文擬從經濟資源、政治資本與社會地位三者的交互影響性，來解釋中國大陸分層化社會的變遷過程，以及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探討的範圍包括中共建政後的社會矛盾以及文革風暴後因為「改革開放」政策所形成的社會問題；最後，評估大陸社會分層化後，日益壯大的「中間階層」和社會底層的影響力，能否成為足以改變現有政治框架的新興力量。

關鍵詞：社會分層、社會轉型、和諧社會、中間階層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ratified society in China

Chung-Man Tseng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unism is a product of times. In front of the unfair social status which was created by capitalism, communism recruited great oppressive masses and revolution disciples to against every injustices. Anti-class, anti-oppression, and anti-privileged became the communist's revolutionary ideal for a long time.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class, oppressive masses, had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supporters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60 years ago. Unfortunately, today the worker-peasant class don't acquire a better living after their wholehearted supporting ev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has been executed for 30 years.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is enlarging the sense of the poor being deprived by the rich. Since the social status is getting down to the bottom, the worker-peasant class lose their patience and express their unsatisfied emotion by drastic action in high frequency. Such sense of being deprived has become a kind of Pandora box which contains an intricate puzzle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political elite of China realize the seriousness of aforementioned problem. They began to strengthen dialogue with masses, expect the emergency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unceasingl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social problems originated from social hierarchical change in view of the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 polit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tatus.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 class evolution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oday's class antagonism in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whether a middle class has appeared after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s which makes Chinese government change the governance means and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 how to appease worker-peasant class is also a thorny issue.

Key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 Harmonious Society, Middle Class

壹、前言

傳統中國數千年來長期處於封建社會並獨尊儒術，不識工業革命也沒有啟蒙運動。滿清末年，閉關自守以天朝自居，因為無感於西力東漸的挑戰，故而錯失現代化契機，並引來帝國主義欺凌，舊中國被迫調整世界中心觀，開始學習西方文明。1911年孫中山先生用十一次革命終結滿清君主專制，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期望將新中國從士農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革命未竟，民國初肇政治紛擾、內憂外患，新中國依然存在著舊問題，憂憤的知識分子體悟到唯有進行一場文化啟蒙運動才能救亡圖存。1919年遲來的五四運動終於在新中國發生，文化覺醒帶來百家爭鳴新氣象，中外各種主義、思潮和訴求刺激著憂國憂民的有志之士。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此國家困局中孕育而生，1930至40年代，中國共產黨藉由抗日戰爭而激化的民族主義，迅速吸納廣大的知識階層和農工階層，1949年建政後，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近百餘年來的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變遷路徑，可說是先歷經國父領導的精英政治革命，才進行五四運動的文化思想革命，再由工農參與的共產革命完成國家體質的全面革新。只是，全民參與的社會革命造就的卻是共產專政及文化浩劫（藍玉春，2007:127）。

中共專政後將國家快速轉型為黨國合一的專政體制、共產的經濟制度與階級鬥爭的社會型態，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實際決定國家整體政策走向，傳統的農業社會搖身一變為共產社會，只是共產主義的理想與現實差距太大，終於引爆文革浩劫，中國社會再一次經歷封閉與民不聊生的困境。1978年鄧小平上臺，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允許共產社會從單一公有制轉向多元的公私並存制，整體社會漸漸從封閉轉向開放、從單一轉向多元、從傳統邁向現代。總體而言，中共建政後、改革開放前，是個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從國民收入分配來看是平均主義；改革開放後，因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分層化社會的發展肇因是經濟開放，部分工農階級突破傳統先天身份指標，包括檔案身份和戶籍身份的限制，開始跨越社會邊緣群體爭取成為社會中心群體。然而從世界各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基本規律來看，身份分層解體，向經濟分層演進的初期正是社會矛盾激化的開始（李強，2002:3-5）。換言之，改革開放前社會分層主要來自政治分層；市場開放後，政治上的不平等又導致經濟上的不平等，社會分層主要來自政治與經濟分層的合流。迄今，嚴重的社會問題已成為撼動中國大陸政治穩定與經濟持續發展的主因。

貳、共產社會的衝突與矛盾

舊中國從封閉社會走來，對統治一個落後大國的中共新政權而言，此期貫穿

著共產主義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首先，毛澤東提出理想的革命藍圖，認為 1840 年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必須進行「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對內推翻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毛澤東，1939）；1919 年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再發起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強調中國革命分成兩個歷史階段，必須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再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毛澤東，1940）。1949 年後，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建政，將土地改革、婦女和工人的地位提升作為新國家的憲政結構和初期立法後盾，並將生產工具所有權制改為公有制（Flemming Christiansen and Shirin M. Rai, 1998:102-103），開始落實「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階段性目標，強調要杜絕封建社會遺習和消滅地主資產階級，公開揭示要逐步邁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陳永發，1998:456-458）。於是，1950 年起相繼發起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1958 年再提出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企圖用「超英趕美」的速度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施行結果卻是整體社會的人力、物力、財力浪費，生產力消退，連年饑荒，繼而引發文革風暴與社會嚴重衝突（蔡國裕，2007:6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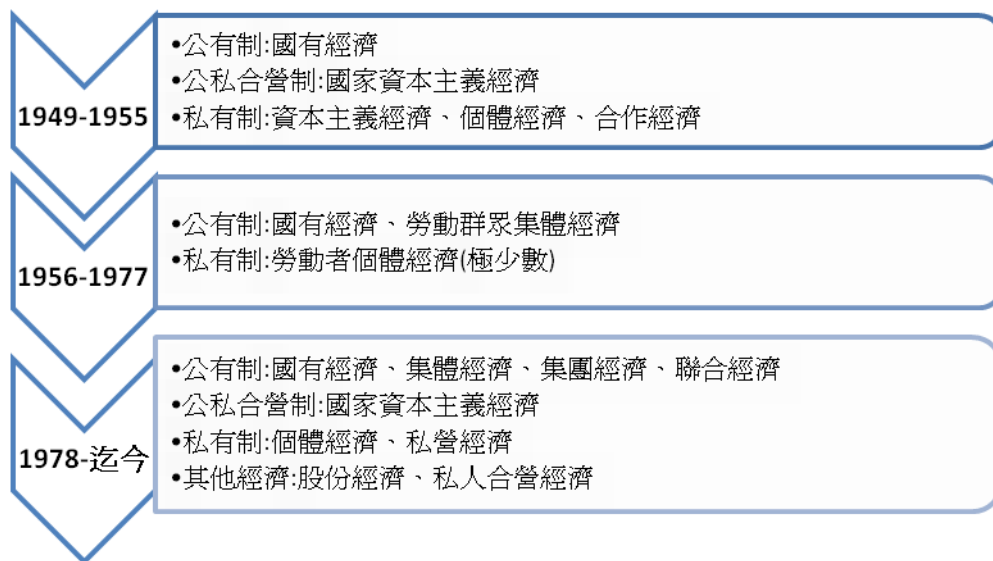
此外，中共新政權在實現全國統一後，逐漸把黨國一元體制深入社會底層，進行所謂的「社會一體化」進程，再一次成功地運用政治動員能力，將人民整體歸類在「單位」之中並統籌管理，以「革命恐怖」在鄉鎮摧毀傳統社會結構，建立起黨對社會的直接與全面控制，並採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絕對平均主義去實現所謂的「社會公平」（閔琦，1995:92-100；陳永發，1998:21）。為了對「社會一體化」的絕對控制，毛澤東對傳統社會進行徹底解構的作為，包括採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並以生產關係中的「單位與地位」來決定社會中的階級，這種嚴格的戶籍制度、單位制度、幹部工人區分的檔案制度、幹部級別制度等構成的身份制度（李強，2002:1），不僅形成僵化的城市或鄉村、幹部或工農、高層或基層的兩元社會矛盾，並且造成工農階級從出生開始就難以跨越的「天塹」。「天塹」讓人民無法自由流動、缺乏生產動力與工作效率，但方便中央管控，於是社會主義所提倡的種種社會公平與共產的「均富」理想，成為現實生活中絕對的不公與「均貧」。

因此，雖說中國共產黨結束了國家內戰，建立了有效控制全國的一黨專政體制，共產主義的社會變革，打破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但縮小社會差別和消滅社會分工的理想，又與現代化的經濟作為相悖離（閔琦，1995:78）。廣大的知識青年與工農階級，期望透過共產主義實現社會平等與均富的理想終於落空。文革後，共產主義所有理想的農村集中組織與社會運動均告失敗，現實社會的整體發展困境呈現為政治利益分配調整困難、剛性社會身份地位難以突破、缺乏有效經濟利益轉移誘因、經濟停滯與社會不公不義。毛澤東所創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與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卻由於領導人的權力鬥爭，反將社會發展導入衝突與矛盾的循環之中。根據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發展法則，人類社會進程應從原始共產社會、古代奴隸社會、中世紀封建社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最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林琳文，1997:2-4）。中國共產社會的種種理想，終因殘酷的政治爭鬥與失當的社會發展策略而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嚴重受挫。

參、分層化社會的轉型原因

大陸社會學者周曉虹認為研究當代中國大陸社會變遷，要以 1949 年和 1978 年兩個歷史時期為標誌，前者將一個分崩離析與高度整合的中國劃分開來；後者則因為有聲有色的經濟改革，將中國大陸推向市場體系，並且真正改變了中國大陸的社會面貌（周曉虹，2002:227）。1978 年鄧小平為了解決文革後國力凋敝與社會混亂的困局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採用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模式，將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轉型為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見圖一）。這個概念，打破了中共習慣以公有制經濟形式來界定社會主義的傳統道路，也為中共重新建設「社會主義初階段」提供有利的施政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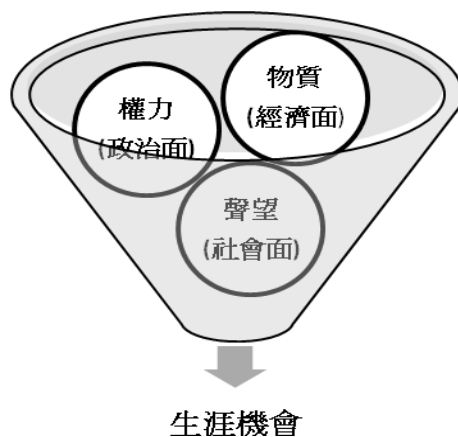


圖一：1949 年後中國大陸所有制變遷圖

資料來源: 施哲雄 (2007:267-271)，作者自行製圖。

改革開放後，在多元所有制並存的經濟體制下，各個獨立個體和組織團體開始可以遵循著自由競爭、等價交換的市場規則運作，人們的交往方式、工作方式、

分配方式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利益格局產生了由利益平均朝向利益分化的方向轉變（章明，2009:1）。人民與政治資源、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的關係於是產生了變化，進而造成社會分層結構的轉變。所謂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根據德國社會學家 Max Weber（1958）的三元理論，指出社會分層是由權力（政治面）、物質（經濟面）和聲望（社會面）三個要素交互而成，而這三者將會影響「生涯機會」的結果（Bendix, Reinhard, 1977:85-87）（見圖二）。換言之，經濟開放後的大陸民眾擁有了廣泛經濟社會資源，就擁有了與掌握政治資源的政黨進行對話、協商和利益溝通的現實基礎（章明，2009:2）；政治與經濟影響力越大，社會階層越高，生涯發展機會就越大。



圖二：社會分層三元理論

資料來源: Bendix, Reinhard (1977:85-87)，作者自行製圖。

回顧大陸改革開放前的社會情勢，因為歷經長時期的政治運動、社會改造與階級鬥爭，經濟活動與社會「中間階層」幾乎消滅殆盡，加上國家壟斷全部社會資源、全面控制社會生活，無論是個人或社會組織都喪失獨立人格與活力。因此，改革開放後，不僅體系內的個人或組織積極爭取自主性，尚未進入體制的新結構也努力爭取獲得合法性（閔琦，1995:312）。擺脫經濟束縛後的大陸社會遂產生一塊獨立自主的新「中間階層」，以提升自身的政經力量來擴大其「生涯機會」。根據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李強的研究指出，改革開放後大陸分層化社會的影響包括（2008:18-34）：

- 一、社會中心群體與邊緣群體的變化: 中國大陸的社會群體關係可用同心圓結構做比擬，高級幹部是典型的核群體，而工農階級則是典型的邊緣群體。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社會資源是由中央統一調配，壟斷與集中化程度高，因

此，越接近中心群體（城市人口、大城市、級別高的大單位），越容易獲取資源。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戰略，促使中心與邊緣群體的配置改變，出現了「政治菁英」隊伍縮小、「經濟菁英」隊伍擴大的新局面。

- 二、社會身份分層體制的重大變遷:經濟開放後，部分工農階級開始突破身份限制，積極參與市場經濟，提升經濟能力，努力從社會邊緣群體晉身中心群體，新的社會「中間階層」於是形成，特別是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等社群的出現。
- 三、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的轉變:改革開放前社會的經濟不平等程度較低，政治不平等程度較高，甚至存在嚴重的政治歧視；改革開放後，政治不平等程度相對下降，而經濟不平等程度快速上升。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社會結構分層化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即是改革開放後經濟力和社會力突破剛性的政治體制，彼此轉化與交互影響。因此，當經濟從平均轉向多元、社會從封閉轉向開放的同時、集權政治也面臨了必須「與時俱進」的要求。

肆、分層化社會的轉型發展

對中國大陸來說，所謂「轉型」，是指社會整體處於相對迅速的轉變中，社會制度、社會生活和人們的社會經驗均發生深刻改變（梁治平，1995:295）。建政以來，「革命與鬥爭」是毛澤東時代的施政主軸，形成了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治與社會也不分是社會特徵；80後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一切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數十年來在中共中央「放權讓利」的指導原則下，經濟規模快速成長，社會關係也迅速轉型，但是政治始終堅持黨國一元專政。「政左經右」的理政模式強調政府乃是國家最重要的核心主體，經濟和社會組織體現為透過政治權力下放，尋求共同分享利益的次級組織與上下隸屬關係。只有「市場開放」、沒有「政治改革」的「改革開放」政策，造成政治與經濟、國家與社會發展速度嚴重落差，不僅限制了新興社會階層的自主空間、增加了政治干預的模糊空間、也加深了社會矛盾。

一、社會多元結構取代二元結構

改革開放前剛性的政治位階與戶籍身分決定社會地位，整體社會結構呈現中心或邊緣的二元結構。典型的核社群包括高級幹部與城市人口；工農階級、鄉村人口與受到政治迫害的廣大知識分子則是典型的邊緣群體。改革開放後中國大

陸社會結構隨著「放權讓利」的政治氛圍，由下而上出現幾個「中間階層」的新興社群：(一) 政治面，地方基層幹部在中共中央「放權讓利」的分權化趨勢中，提升了政經實力和社會影響力；(二) 經濟面，因為經濟制度從限制私有制改為保障私有制，部分國營（集體）企業下崗工人及農民工順勢突破身分限制紛紛加入自由競爭市場，成為經濟自主的個體戶或私營企業社群；(三) 社會面，改革後整體社會棄置毛澤東時期的「讀書無用論」，1980年鄧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人才四化」政策，積極培養具有「專業化、年輕化、知識化、革命化」的人力資源，知識分子因此獲得政治平反，回復了應有的社會地位和聲望（李強，2002:12-13）。這些向上流動的社群透過生涯機會的提升，形成了日益壯大的「中間階層」，整體社會因此從二元結構轉變為多元結構（見圖三）。



圖三：1949年後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變遷圖

資料來源：李強（2002:12-13），作者自行製圖。

從社會學理而論，社會階層上升流動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穩定的安全閥（safety-valve），經濟水平、社會地位、政治權力的上升，會增加上升群體對國家與社會的認同感；但是按照社會結構變遷的規律來看，身份分層向經濟分層演進的初期卻是社會矛盾激化的開始。可以這麼說，改革本身就是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現今中國大陸社會利益結構中的各個群體都在分化、解構（disorganization）

和重構 (reintegration)，只是中間層仍嚴重欠缺，呈現出的是一種底層大、中上層較小的「金字塔型」結構，而非「中間階層」壯大的「橄欖球型」社會結構 (李強，2002:3-12)。中國社科院將年收入 6 萬至 50 萬元人民幣的家庭定義為「中產階級」，占總人口 23%，約 3.1 億 (參與網，2013.1.21)。另根據 201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的「國際城市發展報告」指出，預估 2020 年，大陸「中產階級」將提升至總人口的 40% (人民網，2012.2.10)。但以現階段農村人口仍高達六億七千萬，占 50.32% 的數值來看 (中國政府網，2011.4.28)，中國大陸社會結構雖然從剛性二元轉向多元化發展，但是「「中間階層」」所代表的「中等收入族群」，所占人口比例不足，尚無法形成社會中堅力量。此外，在大陸一元政治體制下，任何社群的發展只允許存在，不能向上挑戰黨國權威。因此，多元社會結構在一元政治前提下，大陸的「「中間階層」」仍因政治箝制力發揮空間有限，所展現的是作為貧富之間的過渡群體，與民主社會「中產階級」所代表的成熟、理性、溫和意涵與緩衝、穩定社會的功能不盡相同 (李強，2013:1-8)。

二、經濟二元化取代社會二元結構

1983 年一份「小城鎮」社會調查報告形容改革開放 5 年後的大陸農村實情：「吃飽、穿暖、有錢花是農民生活改善和農村經濟繁榮的具體內容」，有經濟市場發展潛力的「小城鎮」開始在城、鄉之間扮演樞紐的角色，但是在群眾語言中也有了社會地位高低意涵的分層模式，那就是「城裡人」、「街上人」、「鄉下人」的區分 (費孝通，1983:210-237)。如今，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基尼指數 (Gini coefficient) 高達 0.474 (BBC 中文網，2013.1.18)，逼近社會暴動。另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0 年發佈的官方數據顯示，依聯合國一天不到一美元的貧窮標準線，大陸有一億五千萬人在貧窮線以下，占總人口一成以上，若再加上貧窮線邊緣的數億人口，大陸的貧窮問題十分嚴重，41.4% 的財富，卻由 1% 的人口掌握 (自由時報，2011.1.25)。開放後，少數人「因緣際會」掌握了絕對多數的經濟財富，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經濟二元化於是取代了社會二元結構，誰是「城裡人」、「街上人」、「鄉下人」，反而成了社會分層化的明確標準。

改革開放前中共中央強調要用階級鬥爭「去階層化」、「反階層化」，但是消除資產階級後的社會，卻是個吃不飽的均貧社會；市場開放後，不講「反階層」，講求「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抓老鼠就是好貓」，「貓論」的概念打破了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限制，卻又形成社會新階級。從社會結構角度來看，大陸近數十年來最激烈的變化，就是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分層的定型化」，使「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 (孫立平，2004:58-59)。身分再度成為社會一種標籤，在許多

時候，「身分」則被進一步固化為某種「資產」（范疇，2012:193）。有權人會變有錢人，有錢人也會變有權的上層階級；沒錢沒權的是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無法翻身的窮人、鄉下人、農人和工人，這個廣大的族群就像碎片一樣散落四方。這種權貴掛勾造成的社會定型化，帶來階級性的「相對剝奪感」和「仇富、仇官、仇權」的心態。誠如大陸社會經濟學家何清漣觀察指出（大紀元，2008.10.27）：「大陸的產業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出大陸經濟增長模式；經濟增長模式則正塑造著大陸社會的反抗模式。」

伍、分層化社會的問題

北京學者連玉明（2011年）曾於「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研究報告」中指出，大陸在經濟高速成長的背後隱藏著種種複雜多變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有五大社會矛盾正處於從潛在風險向公共危機轉化的臨界點：一、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基尼系數逼近社會容忍線；二、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浮現並有激化趨勢，通貨膨脹、分配不公、貪污腐敗是當前的首要問題；三、治安形勢嚴峻，無直接利益關係的群體事件或惡性事件呈上升趨勢；四、仇富、仇官、仇權的社會心態日漸突出，極易借助現代傳播媒體迅速放大為社會危機；五、非傳統安全危機正成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央社，2011.9.16）。這些來自社會分化的非傳統危安警訊，反映出上層階級與底層民眾之間，並沒有妥善的利益交換管道或雙向溝通機會，不被重視的社群漸漸趨向採用較激烈的對抗方式來宣洩心中的不滿。根據調查大陸近年來的社會反抗事件主要是四大問題：一是反征地；二是反拆遷；三是反環境污染；四是洩憤型的抗議行動（何清漣，2008）。可見，經濟資源、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三者交互影響所產生的定型化社會階層，再一次形成了有錢、有權人與沒錢、沒權人之間難以跨越的「天塹」。

一、「和諧社會」的不和諧

2004年中共前任領導人胡錦濤上任後隨即提出「和諧社會」的施政願景，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模式同時帶給人民財富和痛苦。改革之初提倡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則強調「大家都要富起來」，還要「以人為本」，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以促進社會和諧（陳明忠，2011:113-114、171）。所謂「和諧」的主要內容是指「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和諧的環境應該要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並解決人的基本權利，包括自由、生存和溫飽權利」（汪澄清、李濛，2010:7-12）。以上的「政策說明」已

相當程度承認了政經資源的分配不公，正是社會不和諧的主因，廣大的底層民眾至今仍生活在缺乏基本人權的社會條件中。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是個資訊不透明的國度，但從最高領導人的重視程度來看，即可明瞭分層化社會的問題已是刻不容緩。中共前任總理溫家寶曾表示：「如果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職，那麼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政府的良心」（陳明忠，2011:153）。改革以來偏重政治「維穩」、經濟「發展」、「成長」與「效率」，反而忽略了社會的「公平」與「良心」。從社會分層化的趨勢來看，建政和改革均不曾改變農民工的命運。「教育、買房和看病」被稱為大陸現代社會的「三座大山」（李政亮，2011:253）。社會階層嚴重的分化和兩極化，看似已使中共領導人體認到必須調整統治習性與國政方略，但以目前「和諧社會」的執行重點看來，社會各階層在政治力的調控下，「和諧」的第一要務就是維持穩定的「大局」。

二、「維穩社會」的不穩定

「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迄今的基本國策，鄧小平曾於1989年在「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一文中完整表述此論點，他說：「中國人這麼多，底子這麼薄，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甚麼事也幹不成。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1993:330）；1990年他再強調：「穩定是前提，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2009年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60週年並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共高層再呼籲：「穩定是發展的前提，是和諧的基礎。沒有社會穩定，何來社會經濟發展？何來社會和諧？」（林偉，2009）。因此，中共深知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沒有穩定的社會，事實上就沒有穩定的政權以及一切的發展成果。

國際趨勢大師 Naisbitt 用「圍地造林讓樹木自由成長」來形容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據他觀察，中國式的「開放」強調放鬆管制但仍須團結一致，在放權與控制之間，重視歸屬感甚於個人化的大陸社會，整體的和諧最重要（John and Doris Naisbitt, 2009:66-103）。換言之，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需受制於黨國支配，對社會的有效控制才是發展的前提、和諧的基礎。而且，一個「好國民」應該幫助國家「和平發展、以和為貴」（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 2009:3）。因此，現階段的社會分層化問題，被定位為改革的副產品（by-product），而非主產品，這些副產品有些不見得是中共當局所想要的，卻伴隨改革而生，並造成某種程度的政治困擾和社會矛盾（王明輝，2003:149）。職是之故，「穩定壓倒一切」，不僅是要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更是要維持「黨國體制的整體穩定」。也就是

說，任何「危穩」的因素和「不和諧」的聲浪，都必須在「維穩」的目標下被「壓制」。

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在追求一個無階級、無壓迫的社會。但以目前大陸社會分層化的情形來看，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真正擺脫黨政階層的控制。「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表象與日常生活現實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嚴重。套用大陸國務院國務委員戴秉國所言：「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而所有這些要務的前提，就是黨必須繼續掌權（Richard McGregor, 2011:23）。換言之，雖然現今社會的流動不再完全受限於政治性，中間族群的出現也使社會階層趨向多元化，但「不被和諧」的自主空間依舊有限。「改革不走回頭路」，仍然期望透過更多「中間階層」的出現，逐漸形成一股社會驅動力，量變促成質變，讓社會分層化的機制更趨於自由競爭，並成為足以推動現有政治框架改革的新興力量；至於底層的反社會聲浪，在未來必然是挑戰中共政權穩定的主要壓力來源，當「一切」受壓迫的反撲勢力形成，「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強力干預模式，極可能演變為一場場「穩定被一切壓倒」的社會革命。

陸、中國大陸分層化社會發展預估一代結論

「反階級、反壓迫」曾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公平與正義」也正是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主旗幟，這個訴求喚醒了廣大工農階層千年來對政治的冷漠，熱情歡迎中國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不幸的是，建政和改革開放都沒有改變農民工的命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累積的41.4%財富，卻由1%的人口掌握，近七億的農民工仍然在貧窮線上掙扎。失衡的貧富差距使廣大的邊緣群體難以翻身，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本的相互轉化又導致新特權充斥，「生涯機會」發展不均衡的分層化問題，更造成社會兩極化，並帶來階級性的「相對剝奪感」和「仇富、仇官、仇權」的心態。經濟二元化所產生的「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社會問題，迫使中共領導人體認到必須調整統治習性以及加強與社會群眾對話，才能邁向真正的「和諧社會」。但是，以目前施政的重點看來，社會各階層仍無法脫離政治力的干預，自主空間有限，「維穩」才是國家基本國策。期盼未來日益壯大的社會「中間階層」，能漸漸發揮應有的成熟、理性、溫和與穩定社會功能，或許將有可能成為足以推動現有政治框架改革的新興力量；至於底層反社會力量，未來必將衝擊中共政權的穩定與經濟的持續發展，「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管控模式，極可能被一波波越來越激化的社會群體抗爭事件所撼動。

參考資料

- 李強(2008)，**中國社會變遷 30 年(197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李政亮(2011)，**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新北市:遠足文化。
- 汪澄清、李濛 (2010)，**和諧方舟:中國拿甚麼奉獻給未來**，北京:機械工業。
- 林琳文(1997)，**後社會主義中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臺北:生智。
- 范疇(2012)，**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新北市:八旗文化。
- 閔琦(1995)，**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來自大陸民間社會的報告**，臺北:時報文化。
- 梁治平(1995)，**轉型時期的法律與社會公正**，載於彭懷恩、俞可平主編(1999)，**中國轉型的挑戰(經濟社會篇)**，臺北:風雲論壇，頁 283-298。
- 費孝通(1983)，**小城鎮大問題**，載於彭懷恩、俞可平主編(1999)，**中國轉型的挑戰(經濟社會篇)**，臺北:風雲論壇，頁 201-238。
- 藍玉春 (2007)，**中國外交史—本質與事件、衝擊與回應**，臺北:三民書局。
- 蔡國裕(2007)，**中共發展史**，載於張五岳主編，**中國大陸研究**，臺北:新文京，頁 46-70。
- 施哲雄(2007)，**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載於張五岳主編，**中國大陸研究**，臺北:新文京，頁 251-275。
- 陳明忠(2011)，**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臺北:人間。
- 陳永發(1998)，**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
- 鄧小平(1993)，**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30-332。
- Christiansen Flemming and M. Shirin Rai 著，潘兆民、黃烈修譯(1998)，**中國政治與社會(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臺北:韋伯文化。
- Naisbitt John and Doris 著，侯秀琴譯(2009)，**中國大趨勢:八大支柱撐起經濟強權**，臺北:天下遠見。
- Marriott David & Lacroix Karl 著，謝佩姛譯(2009)，**中國無法偉大的 50 個理由 (Fault Lines on the Face of China: 50 Reasons Why China May Never Be Great)**，新北市:左岸文化。
- Richard McGregor 著，樂為良譯(2011)，**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臺北:聯經。
- 王明輝(2003)，**中國大陸後社會主義社會階層化之探討**，**澎技學報**，第 7 期，頁 135-166。
- 周曉虹(2002)，**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南京大學學報**，第 3 期，頁 227-236。

- 李強(2013)，關於中產階級和中間階層，**中國人民大學學報**，載於**光明網**，2013年1月4日，
http://big5.gmw.cn/xueshu/2013-01/04/content_6239826.htm。
- 李強(2002)，中國大陸社會分層結構的新變化，**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node_5306436.htm。
- 孫立平(2004)，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與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當代中國研究**，頁58-61，
http://cfcc.nthu.edu.tw/~newsletters/series/4/pdf/workshop1_sun.pdf。
- 毛澤東(1939)，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20031219/00159161.html>。
- 毛澤東(1940)，**新民主主義論**，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big5/nonmarxists/mao/19400100.htm>
- 中國首次公布十年來基尼係數，**BBC 中文網**，2013年1月18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3/01/130118_china_gini.shtml。
- 中國赤貧1.5億人一天賺不到1美元，**自由時報電子報**，2011年1月25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an/25/today-fo4-4.htm>。
- 中國中產階級盼穩定，**參與網**，2013年1月21日，
<http://canyu.org/n66836c11.aspx>。
- 北京學者：大陸進入危機頻發期，**中央社**，2011年9月16日，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109160072-1.aspx>。
- 林偉(2009)，重溫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08月14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9858957.html>。
- 何清漣(2008)，改革三十年與中國的畸形發展，**大紀元**，2008年10月27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8/10/27/n2310544.htm>。
- 章明(2009)，從公民社會的興起看中國政黨制度的建設，**人民網**，2009年11月25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37/10450076.html>。
- 8年後中國中產階級將佔人口40%，**人民網**，2012年2月10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0731/17072753.html>。
-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資料公報，**中國政府網**，2011年4月28日，
http://www.gov.cn/test/2012-04/20/content_2118413.htm。
-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投稿日期：102年8月26日；採用日期：102年11月18日)